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 /丁学良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2
(大学之道丛书)

ISBN 7-301-08234-7

I. 什… II. 丁… III. 高等学校—研究—中国 IV. G6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7393 号

书 名: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

著作责任者: 丁学良 著

丛书策划: 周雁翎

责任编辑: 姚成龙

标准书号: ISBN 7-301-08234-7/G · 132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yl@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6

排 版 者: 北京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82715400

印 刷 者: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70 毫米×970 毫米 16 开本 14.5 印张 200 千字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3.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盗版举报电话:(010)62752017 62752033

序 言



从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几个月开始，我有机会陆陆续续在中国内地最具名望的和相当具名望的几所大学里，应邀作有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公开演讲。这些演讲的少部分内容，经演讲活动组织者的事先安排，录音后整理成文字摘要，在国内的几家学术刊物上发表，引起了并且还在触发着热烈的讨论。2003年12月底我在为出版这本书作准备工作时，用“雅虎中国”搜索引擎寻找互联网上对我的言论的引证和点评，发现五千五百余条中，绝大部分都是与大学的发展和改革相关。

我对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长远目标，抱着宗教般的热忱。至于你要问我为什么会对这个话题如此入迷，我却很难给你提供一个穷尽其缘由的清单。也许这跟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文化氛围有关：我的故乡是皖南，那儿除了盛产穷人外，还盛产文人，因“文”而名垂青史者历朝历代都不缺乏，这其中就包括二十世纪初从美国名校留学归国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的胡适之博士。在我们皖南学童幼稚的心灵里，著名学校的魅力，无异于虔诚信徒心目中的本教圣殿。

这里面的原因或许也与我青少年时代的国际政治氛围有关：1970年代前半期，世界外交大棋局之柳暗花明、峰回路转，最重要的契机乃在于中国和美国关系的解冻，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力量态势的重组。那时候，全中国知识分子唯一能够有幸读到的高水平的国际事务报刊，是所谓“内部发行”的《参考消息》。这份每日四小页的译报上，差不多天天有关于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布热



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的报道与分析。这两位均是在著名大学拿到博士，在著名大学任过教授，又以在著名大学里原创性学术研究的成果，指导本国外交战略的与时俱进、推陈出新。那个年代的我，初中没有读完，高中没有上过，大学没有指望。每每与一同读评《参考消息》的母校宣城中学的陈老师仰天长叹：美国大学培养的人才为国效劳的方式，是以新颖的战略观念重组世界；中国大学培养的人才为国效劳的方式，则是上山下乡去修理地球！

我对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长程目标执著入迷，最直接的原因，当是我在美国留学期间经历的强烈刺激和理性反应。我在留学过程中因为语言、文化、价值观念、民族认同诸多原因而受“洋罪”^①的同时，并没有愤愤到失去理智上的基本平衡——如果美国的高等教育，特别是它的研究型大学在总体上不具备全球最强的竞争优势，其他国家数十万的青年学子（少数是中年学子和少年学子），不会每年花费总额超过一百亿美元的资金，来此求学深造。外国留学生对于美国大学课程和研究项目中的某些价值观不能认同，积极的反应之道乃是：你们以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知识创新精神和与此相配合的制度，来改造你们本国的大学，努力使之成为吸引各国留学生的另一个中心；若此，这个世界就会在价值观念的源头上，更加多元。这种理性的反应方式，较之“文化大革命”式的“凡是美国有的，我们都说不！”远为有意义得多，因为它更有益于你所归属的国家和民族。我的这种态度简要地反映于下：

2004年春节，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按照往年的习惯，让我给中评网学者社区发一条“新春寄语”。我遵嘱写道：

中国人过年，习惯于多讲吉利话。我也随大流，说句吉利的——

祝愿中国最好的几所大学，能诚心在制度方面向世界上的一流研究型大学学习，切实改革，争取在本世纪内把自己建成


^① 我在《丁学良集》（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版）的“序言”里，对这类“洋罪”有较详细的交代。这本书早已经绝版，读者可参阅笔者的《不敢恭维——游学世界看中国》（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1月版）里的“自序”和相关的章节。

在国际上真正被学界同行们看重的学府。拒绝走这条路，只会
有越来越多的学术腐败，越来越少的学术成果。

我的这一态度，其实秉承的不过是中国现代科学和高等教育的
开创一辈的思行之道。前不久读到一条史料，述及：在 1927 年国立
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前，中国的科学研究“还没有成为一种专门的职
业。虽然涌现了一批科学社团，但在这些社团中没有一个具有完整
的功能，能称得上是中国科学体制确立的标志”。由任鸿隽、杨杏
佛、竺可桢、秉志等领导的中国科学社（1915 年底成立于美国，
1918 年移回中国），是其中功能最多的社团，但它的权威性也不足以
代表中国全国的科学界。正因为如此，在 1926 年 11 月日本东京第
三届泛太平洋科学会议上，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在本届会议上选举产生的永久性组织——太平洋科学评议
会中，有美国、澳洲、苏俄等十二个国家，却偏偏没有太平洋
沿岸的另一个大国中国。后经中国代表抗议，增补中国为该组
织会员。任鸿隽记述道：“此次太平洋科学评议会，不让中国加
入，他们唯一的借口，就是中国没有一个代表全国的科学机关。
后来我们虽然把中国科学社抬了出来，搪塞过去，但在外国人
心目中，我们中国还是没有有一个学术的中心组织的。我们在东
京的时候，每每有人问：你们中国有学术研究会议（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吗？我们的答应是：没有。他们再问：那么，
你们有科学院（Academy of Science）吗？我们的答应还是：没
有。说到第二个‘没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得见失望或轻蔑的
颜色，立即出现于你的问者面上，你自己的颜面上也不免有点
赫赫然吧？固然，一个学会的有没有，于一国的文化，并没有
什么大关系，但至少可以代表我们学术的不发达，或我们的不
注意。所以到了时机勉强成熟的时候，希望我们有这种相当的
组织。”

这件事深深刺激了当时从欧美留学归国的中国科学家，“使中国
科学界痛感成立一个能代表国家的科学院已刻不容缓”，于是就有了



·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 ·

一年以后仿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科学院体制的中央研究院的创建，中国的科学研究之制度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① 如果这一代留学生采取非理性的民粹主义拒斥方式，中国的科学现代化不知又要延误多少年。

从世界看中国

今年（2004）春节刚过，北京的文化学者崔卫平女士到香港的几所大学从事学术交流，专门拨出宝贵的一个下午来香港科技大学做访谈。她问我 1984 年离开中国赴美国留学以来的二十年里，游学四方，所学到的东西中最主要的是哪些，我总结的两个要点之一，便是大学的素质与国家的竞争力血肉相关。我在回答她的问题时，心中正思考着修编本书的事，下面一部分言论，实在是针对着本书的未来读者而发的，用在这篇序言里，至为切合。^②

丁学良：我和很多中国读书人一样，不管在世界的什么地方，都是怀着一颗中国心，就是说你头等关注的事是中国的问题。但是不应该沉浸于“中国心、中国观”。什么叫“中国观”呢？就是仅仅就中国看中国，那种似乎是完全在关注中国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会产生非常狭隘偏颇的结论，很容易误导别人。所以我提倡的是“中国心、全球观”、“中国心、世界观”。你一定要把眼光尽可能地放得开。

崔卫平：在你的比较研究中，除了以上的，还有什么其他感受深刻的题目？

丁学良：我很关心的另一个话题就是大学制度。这二十年来在世界范围的综合评鉴中，亚洲能进入前五十名的大学一个也没有，中国内地能进入前一百五十名的大学一所也没有。进入大学排行榜前二百名最多的亚洲国家是日本，它的大学制度当年是从欧洲学来

^① 以上资料引自徐明华：《中央研究院与中国科学研究的制度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南港），1993 年 6 月，第 22 期，下册，第 241—242 页。

^② 该访谈的全篇要点，载于《南方周末》，2004 年 3 月 25 日。我在此要感谢刘小磊先生对这篇访谈的精心编辑。

的，但后来没有迈出第二步——仿效美国之长的改造。中国 1949 年以前的大学制度和日本的来源类似，后来却改造成了苏联式的，与世界大学发展的主流脱了节。从比较研究的视野可以看出，等到新的产业部门越来越以知识创新为前提、国家的综合实力越来越依赖于“软力量要素”的时代，原来亚洲从十八至十九世纪的欧洲引进的大学制度就不够用了，更不要提苏联式的了，必须进行第二步的改革。

崔卫平：这第二步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

丁学良：这方面美国对亚洲的启发极大。当今世界上，美国的大学数量最多，办大学的模式最多样化，效果相对而言也最好。美国当初在引进了英国、德国的大学制度之后，结合自己国家发展的需要和国际竞争的趋势，进行了长期的、多元的改革创新，1950 年代起逐步取代英国，成为全世界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大学办得好，太得益于办学的多样性。它的大学不是一个以公立大学为主的体系，而是社会多元的财源办大学，因此葆有活力。美国也有公立大学，但大部分大学是私立的，最著名的几所都是私立大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 1990 年代更为突出），美国体制的大学日益成为研究的中心，这种模式对十八至十九世纪欧洲式的大学提出了很大的挑战。^①我在美国十年，经历的是美国制度，在香港和澳大利亚十年，经历的主要是英国制度和对它的改革尝试，所以体会非常深刻。美国大学的优势到 1970 年代都不是很明显，从 1970 年代之后越来越突出。美国的一流大学重视开创性的研究，而且研究不仅仅局限在象牙塔里，它还重视把研究成果进行“产学结合”，带动新的产业。它们的研究也不仅仅局限于应用技术，在基础科学和社会科学上都非常活跃。所以如果我们把“产学结合”的这个“产业”的概念在社会科学的意义上扩展，那么可以说它对于行政现代

^① 在自然科学领域里，英国在 1960 年代获得十一项诺贝尔奖，1970 年代获得十三项，1980 年代获得四项，1990 年代获得两项。根据英国 Warwick 大学教员 Andrew Oswald 的研究，在当今世界上千二百位论文被引用最多的科学家中，只有八十位在英国工作，而有七百位在美国工作，这个趋势还在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上升。资料引自“Higher Education. The Ruin of Britain's Universities.” *The Economist*, November 16th 2002, p. 52.

化、国家的公共政策、发展战略、外交政策、国际竞争，都有巨大的助益。这个模式对亚洲来讲挑战太大了！一个国家的大学的创新能力不够，就会坏事，因为大学在现时代，无论从科学角度、技术角度还是制度角度、观念角度、文化角度，都是整个社会创新的最重要的源头之一。

崔卫平：大学里的创新思路，如何对政府在制定政策方面起引导作用？

丁学良：一个大国的研究型大学所起到的作用，与政府或企业办的研究所不一样。不一样在于，政府自己办的那些研究所，研究的问题在政策层面上比较具体，偏向于执行的方面。但对于一个国家发展影响最深远的，是那些开放性（open-ended）问题的独立研究，这应该是在大学里进行的。比如美国社会里的种族关系，在1960年代激进主义的时代，大学中的大部分研究成果认为，美国社会欠少数民族尤其是黑人的太多，因此应该大力扶持少数民族（尤其是黑人）。但是那时候也有少部分大学里的研究成果不同意这样做，指出这样做的话，可能会有两个坏处。一是那些非常有能力的白人有可能被歧视，这会在整体上影响美国社会的发展，而且也不公正。第二，更有意思的观点是，少数民族中那些真有才能的人也不愿意这样做。他们认为，如果少数民族人士升得很快，这些成功不是基于他们能干，而是他们受到了特殊的照顾。这样可能在少数民族中产生一种依赖思想，他们用不着非常努力，因为他们一定会得到特别照顾，这就无意识地鼓励了懒汉思想。这两种观点自1960年代以后一直在争辩，大部分时候是前一种补偿观占主导，但到了1990年代中期，社会观念开始转变——越来越强调以后还是应该对所有的种族用同一个标准去衡量。我自己并不认为这两种政策哪一个是完美的、应该永远执行下去，但是我认为美国的研究体制好就在这个地方，它让多种观点都能够发出声音，虽然有的声音大，有的小，因此这个国家不会把一条路走绝，它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不会出现那种不顾一切代价、蛮干到底的状况。这一点值得我们中国人重视。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中，无论是国内公共政策方面的问题，还是外交政策方面的问题，研究项目不是“一刀切”，没有统一的口

径，没有预设的结论，所以走新路的机会不至于被封闭，出了差错能很快地改。

崔卫平：这样一种开放的大学研究体制，肯定需要同样是开放的人才引进制度？

丁学良：要想使大学为社会进步、为国家各领域的发展提供创新的源头，重要的是大学必须开放地向世界招聘人才。全世界办得最好的大学都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好大学本身就应该全球化的先锋，只要看看著名大学的背景就知道了。譬如早先的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吸引的师生决不仅仅是本国的，至少是欧洲各地的，后来又吸引了北美的好师生；德国的洪堡大学、海德堡大学是整个中欧人才的聚集地；美国那些最好的大学的教授和学生更是全球化的。亚洲的大学直到二十世纪快结束时，教员还没有全球化，学生全球化的也少，这样就严重限制了它们创新的机制。道理很简单，人只有来自五湖四海，才能把天下最有意思的观念和设想带来。人才是互相刺激的，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才会产生刺激。这是我最想在中国呼吁推动的事情，就是让中国资源最丰富的那些大学，在招聘教员的时候全球化。研究型大学还有一个基本的社会责任，就是在观念方面、公共政策方面、外交战略方面（这些也就是“软力量要素”），成为国家整体利益最好的代言人和推动者，这个角色对后发展的中国来讲更重要。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些应用科学的成果还可以拿钱去买到，但是在开发那些软力量要素上、在给本国国民提供开放性的思路，用金钱去买是买不到的。这是中国的大学最应该发挥的公共服务职能。

鸣 谢

这本关于大学的演讲录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真是既合情又合理：这些演讲里的好几篇，都是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作出的；这些演讲里的很多内容，又都是与北京大学的改革（指2003年初夏尝试启动的那一波）相关的。我在把它们编辑成册的时候，做了几项系统的技术修订。第一，我是以逻辑次序而不是以时间次序来排列

各篇，这样有助于读者的顺理思考。^① 第二，我加上了一些在演讲时无法列出的参考书目和资料索引，有助于读者对相关问题作更深入的阅读和研究。第三，我对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后发表出来的演讲稿作了全面的修订，这主要是因为我的浓重南方口音给别人造成不小的困扰，当他（她）们听不懂的时候，只好猜想，往往整句整句地误解了我的意思。这不怪别人，只能怪自己的普通话太次。^② 所以我恳请读者诸君日后要以本书为准，来引用——不论是同意还是反对——我的相关主张和论述。

不过，我在整理演讲稿时，并没有将它们“正规化”成庄严的论文，这多半得益于1999年我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演讲后主持人吴志攀教授的诚恳建议。他说：“你以后把演讲稿整理出书的时候，还是应该保留它们原有的口头表达的自然本色，这样学生们读起来亲切些。”

这本演讲录的出版，首先要感谢当年那些邀请我去他们的大学或学院作公开演讲（半数以上为无报酬公益性质）的诸位，以及不厌其烦出面组织演讲的诸位（我这里不列出各人的行政职位，只列出当时他们的学术称谓，因为前者是暂时的）：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吴志攀教授；清华大学的李强教授、沈原博士；浙江大学的姚先国教授；武汉大学的黄进教授；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杨东平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郑也夫教授、周孝正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楯研究员、陆建华博士；西南财经大学的倪克勤教授、谢韬博士；四川大学南亚与中国西部合作发展研究中心的张力教授、谢代刚研究员。

我非常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周雁翎博士在筹划和出版本书全过程中的运作，他的敬业精神实为可嘉。

我还要感谢北京大学《燕园评论》和《燕南网》的郭琼虎主编、

^① 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有几场演讲和几次长篇访谈，围绕的问题密切相关，我在修编本书时，无法把部分交叉和重叠的段落完全删节，因为那样一来，上下文就接不上气，读不通了。这一点要请读者诸君原谅。

^② 我还记得第一次到台湾作学术交流，给别人打电话时，往往被误解成“你是眷村里的？”因为在那儿，只有当年苏浙皖一带过去的大兵们及其家属子女，才会说这种乡音浓郁的“国语”。

北京资深记者曲力秋女士、广州《南方周末—名牌》杂志社的黄惊涛编辑、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的几位研究生在讲稿整理过程中对我的帮助。

值得我特别感谢的，是广州《21世纪经济报道》的评论部主任龙希成。正是仰赖于他的敬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才使这本集子中的好几篇得以问世。

当然，若无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姚成龙先生逐字逐句的技术编辑，本书决不可能以目前这样的素质奉献于读者诸君。

毫无疑问，以上的诸位，均与本演讲录所表达的观点没有关系。

2004年3月8日草就于香港科技大学

2004年9月12日修改完毕

一摇何谓世界一流大学？^①



如何兴办第一流的大学——尤其是在中国的大地上尝试做这种事，如何衡量大学的素质——尤其是在世界的大尺度上这么做，我对这个问题的比较系统的关注开始于 1980 年代的前半期。那时候我在美国读研究生，我的导师贝尔教授在哈佛大学退休前的最后两年，到英国的剑桥大学——哈佛大学是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创办的——做了两年的访问学者，头衔是 亨德里克斯·庇特（庇特荣誉讲座教授，庇特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任英国的首相），这是剑桥大学对外国学者所给予的最高荣衔之一。他告诉我，他在英国期间从事的研究课题，将会是英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对英国国际地位的升迁有哪些影响。这启发了我在考虑中国的大学的时候，也要把它们与中国的国运联系起来看。不过，虽然这个问题是我多年的兴趣和关注所在，但是只有到了目前的时候，也就是中国政府正式提出“科教兴国”大政策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在内地有了广大的听众。

我从 1980 年下半年开始就着手收集零零星星的、多种多样的大学评鉴标准和相关的报告，这个资料的收集工作到今天也没有中断。此外，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受益于过去这些年里我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几个研究型大学中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对它们的教学研究

^① 本标题的演讲我先后作过三次，内容大同小异。第一次演讲是在北京大学，由该校光华管理学院组织，时间是 1980 年 12 月 10 日。第二次是同年 12 月 15 日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多功能厅，由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国家图书馆信息咨询中心等单位联合组织。第三次是在杭州浙江大学，由该校经济学院组织，时间是 1980 年 12 月 15 日。我这里把三次演讲综合成一篇，并且保留前两次演讲结尾处主持人、评论员和听众们的评论、提问及我的回答的要点。

学更重要的是创造知识的机构，是研究的中心。^① 这是大学理念的第二个阶段。

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现代市场经济、现代工业社会、现代国家体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以至于一个人如果没有受到专门、系统的训练，他就很难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已经不能对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涉及本行业的事情进行有效的操作和管理的时候，第三种大学的理念就提出来了。它指出，大学不单是一个教育的机构、一个研究的机构，大学还应该是一个服务的机构，意思是说，我们要为即将在非常复杂的行业和部门就业的人员，提供系统的训练，为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公共部门等领域提供智力支持。如果没有这种专业、系统的训练，一个人将来找工作就只能做体力劳动，不能做脑力劳动，不能做管理阶层的工作。美国是兴起对大学职能的第三种见解的主要地方，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陆陆续续地开办了一些“高等专业技术学校”（~~职业技术学院~~），涉及工、农、商、军事、师范等行业。不过当时也有对这种观念和做法提出反对意见的，就连哈佛商学院的创建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这里插一句，欧洲越是古老的大学，对开办专业学院越不热中，像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直到二十世纪后期才开办商学院，因为那里面传统的大学者们不认为商学院属于“学术”的范围，所以它们的商学院在世界上目前还排不到前列。这里要补充一句，牛津大学校方是在1965年才正式推出方案，创建 ~~沙依德商学院~~（沙依德商学院）。牛津大学的许多教员对这所新学院很是瞧不起，认为商业管理的研究和教学与具有近九百年历史的牛津学术传统匹配不上。校方花了很多功夫，才平息了这场愤怒的老派学者们的“造反”。商学院成立不到四年，就吸引来不少的捐款，设立多个教席。它的追赶目标，当然是美国的那些一流工商管理学院。不过，牛津大学校方至今还是不敢走得太快，他们虽然也仿照美国的富有的私立大学，开办了“大学发展办公室”，专职向校友和社会募捐，但是却把办公室

^① 徐明华：《中央研究院与中国科学研究的制度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南港，~~1988年~~ 1988年 远月），第 100 期，下册，第 100 页。

评鉴研究型大学的一般标准

研究型大学的评比，在同一国家里不同的评鉴机构使用的标准有差异，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当然更有差别。比如，~~1994~~1994年的英国《泰晤士报》上曾经刊登过英国近年来使用的一种评鉴标准，就与美国常见的标准不一样。而且，从~~1994~~1994年代以来，各类评鉴标准一直都在变化着。^① 不过，对于当今世界上几个高教发达国家中重要的对研究型大学使用的衡量标准，我们基本上可以归结为这么九条。

教员整体的素质

这是所有标准中最重要的一条，因为出色的教师才能吸引来出色的学生和大量的资源，各种各样的资源——捐款、研究基金、对研究成果的开发利用的投资，等等。“教员整体”（~~教員整體~~）是指在一所大学里正式任教的全职（~~全職~~）教师，包括最资浅和最资深的，但不包括行政人员、辅助和后勤人员、短期访问人员及兼职人员，主要是这些人员的聘任标准是不一样的。

教员整体的素质由一些技术性的指标和一些比较抽象，但仍然是可以把握的指标来组成。由于它们比较复杂，这里我要多讲几句。硬的技术性指标，主要指的是一所大学里所有的教员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数比例，比例越高越好。这个指标从~~1994~~1994年代以来显得越来越重要。在这之前，在西方相当好的大学里面，没有博士学位但是教学和研究工作都做得很好的人，也可以做一名教授，因为那个时代博士训练还没有全面地建制。而在这之后，博士学位成了在大学里面任教的入门证，没有博士学位，就无法进入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当教员。你经过了博士训练的程序，说明你掌握了进行独立教学特别是独立研究的工作能力。博士学位就像是飞行员的资格证，你说你飞行技术很高，但你不通过考试，手里没有证书，别人就不

^① 参阅林文瑛：《大学的理念、教育品质与大学评鉴制度》，载于杨国枢、瞿海源、林文瑛编：《新世纪大学教育》（台北：前卫出版社，~~1994~~1994年 1 月第一版），第 ~~103~~103-104 页。